

这么多年了，

我们还是

不懂日本

J  
A  
P  
A  
N


刘柠——著



非外借

这么多年了，  
我们还是  
不懂日本

刘柠——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刘柠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207-0524-0

I. ①这… II. ①刘… III. ①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8259号

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

(ZHEME DUO NIAN LE, WOMEN HAISHI BUDONG RIBEN)

作者:刘柠  
策划:陈卓  
责任编辑:张永俊  
责任审校:金学勇 孟昭勤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编:100007  
印刷:北京市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80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0524-0  
定价:49.0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 目 录

代序 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 / 001

## 辑一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黄祸论是怎样炼成的 / 017

“葡瓜效应”的陷阱 / 024

平行线与柱子

——从《扶桑十旬记》说开去 / 032

日俄战争中的一场著名论战 / 040

关于“支那”问题 / 044

日本战时的新闻出版审查 / 047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识 / 049

流产的东京奥运会 / 062

- 周恩来的留东岁月 / 065
- 东京的胴体中植入了青春中国的 DNA / 069
- 亲日文人的日语水平 / 086
- 从两部宪法看日本立宪主义的蜕变 / 089
- 中日关系中的误解与错位
- 在财新午餐会上的演讲 / 106

## 辑二 现实与历史的混响

- 东亚的“磁力场”
- 从“以德报怨”看蒋介石的对日怀柔情结 / 117
- 正面解读外部世界对中国现实的反应 / 138
- 跨境税改与经济的“用脚投票” / 141
-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 / 147
- “被爆民族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 160
- 美日同盟的严峻考验 / 163
- 日本“万岁”谈 / 166
- 无须言必称“军国主义复活” / 169
- 安倍缘何对修宪问题念兹在兹 / 173
- 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 / 176
- 爱你因为爱自由
- 我为什么说“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 / 190

我之喜欢日本，并没有到照单全收的程度 / 206

### 辑三 从历史人物看历史

在“鲁迅也是人”的背后

——兼谈鲁迅日记“失记”问题及其他 / 225

《花甲录》与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 238

中江丑吉：祖国的陌生人 / 249

贝雅特·戈登：日本男女平权之母 / 265

山口淑子何以成为“李香兰” / 272

山崎丰子：“带着笔和纸入棺” / 280

“不用把中国写得很美，只要是真实的”

——女作家山崎丰子回忆胡耀邦 / 283

土井多贺子：“纯情理想主义者” / 288

陈舜臣：横站于中日文化夹缝中的寂寥文士 / 291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 / 294

桥本恕：应对“复杂中国”的复杂外交官 / 308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 311

附录 晚近十年汉语传媒写作之回望

——在腾讯《大家》首届笔会上的发言 / 327

代跋 承平的平成：所失与所得 / 335

## 代序 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

由于历史的积怨，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及文化差异，中日两国媒体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焦点模糊、失真，甚至错位。这种状况会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会妨碍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因为媒体会把一个扭曲并放大的邻国像（日本像或中国像）强加给读者，从而影响其日本观或中国观。其次，在相互理解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出台的外交政策，易受制于民意，往往带有很强的反制、报复色彩，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隔绝。最后，中日关系频密颠簸、持续紧张的状况，反过来损害了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双方的“国益”，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对全球化的依存已不可逆的今天，这一点根本无须诠释。

理解一个国家，本质上是理解一种异文化，免不了要夹杂想象。但这种想象，务须是建立在对其主要社会特征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合理想象。否则，对异邦的想象，就成了“想象的异邦”；对它的谈论，是“飘忽的照准”——基本上等于虚构的文学创作。那么，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无疑见仁见

智的问题，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但如果以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社会是一个儒教社会的话，这就跟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于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东洋社会的文化，绝非儒教的“温良恭俭让”所尽可涵盖。因而毋宁说，日本社会是一个彩色多面球，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呈现不同的面向和光泽：既有残酷的社会竞争，又有家族式的温馨；既有代表世界最高工业文明水准的、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又有代代相传、手工作坊式经营的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源于神道教的武士道文化可以与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基督教文化并行不悖，甚至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境地。

恐怕没人否认，中国社会高度的复杂性、混杂性，既有现代性的一面，也有部分后现代的特征，甚至不排除尚停留在前现代的部分。一个北京城，从东往西，或从北往南横切，不出五环，便能看到几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子社会，既有 CBD、奥运村那种橱窗般完全西化的现代社会，也有小胡同里的大杂院那样传统的市井社会和垃圾场旁边上访村那样的“蚁民部落”。与之相比，日本则是一个单纯得多的均质化社会，这个社会在当下的最主要特征，在我看来，不是别的，而是后现代性。

### 后现代性是关键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顾名思义，是现代主义（Modernism）之后，指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定型并日益坐大的一种迥异于此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文化。詹明信说：“表面、缺乏内涵与无深度，这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最



基本的特征。”鲍德里亚则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仿真世界：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电视就是世界”。原先那种靠全社会共有的传统叙事和规范意识来共同维系的社会秩序令年轻人感到压抑、窒息，他们选择“逃亡”，或干脆背过身去。于是，现代主义下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力，个性自由、自我决定论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开始受到肯定，只以自我的方式和节奏生活，注重自我感受而不在乎社会评价，“爱谁谁”的年轻人群激增。

这种崭新的文化景观并非在日本率先出现，但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后长期的经济萧条等，在日本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御宅族”（OTAKU，或“宅男”“宅女”；台湾地区则通称“阿宅”“宅人”）为代表的，以漫画、动漫、电玩、影像等平面形式的视觉消费为中心的亚文化趣味共同体开始形成。9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群体开始凭借其氛围独特的“萌”（MOE）文化向全社会辐射价值观，影响之深远，甚至溢出国界，蔚为大观。

作为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后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化上，在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均有所体现。但中国媒体，包括许多学者并不理解邻国社会的这种潮流，往往喜欢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想当然地往日本身上生搬硬套，无异于借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用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兹举两个例证，来说明对日本的误读。

一是对“宅”现象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陷入持续萧条怪圈，经济低迷。对此，政府实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调整的主要思路，是从传统的日式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即导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日本企业多承袭“终身雇佣”的传统，且有独立工会等劳动方权利保护机制的约束，裁减冗员并不容易。企业为确保利润，遂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削减正式雇佣规模，同时大量采用派遣人才（即从人才派遣机构招募的临时雇佣者）。

如此，未出十年，“飞特族”<sup>①</sup>、“尼特族”<sup>②</sup>等青年非就业人口激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贫困的现象，被社会学者三浦展命名为“下流社会”<sup>③</sup>（据日总务省统计局在《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中的统计，2002年，15—34岁的“若年无业者”达231万人，1992年以来的十年间净增80万人）。

但是，一般来说，被认为构成了“下流社会”基本盘的“飞特族”“尼特族”，是不包括“御宅族”的。二者虽然有交集，也有共同点（均为非就业），却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一勺烩”，因为前者是社会学概念，后者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前者，有精确的社会学统计。最新的数据表明：2012年度，“尼特族”再创历史新高，达63万人，占同龄人总数的2.3%；“飞特族”多达180万人，占同龄人总数的6.6%。<sup>④</sup>可对后者的实态，碍于“御宅族”及对近年出现的另一个被称为“HIKIKOMORI”<sup>⑤</sup>的现象的定义莫衷一是，始终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连其人口规模都迄无定论（这方面最极端的数据，来自矢野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认为日本全国人口的25%为“御宅族”）。但“御宅族”是一个在日本社会早已存在，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扩大的人群。“前御宅族世代”（Pre-OTAKU）是“50后”，70年代即登场；“第一代御宅族”是“60后”，登场于80年代。其后，直至“第四代御宅族”的“90后”，“代有才人”，各领

---

① 即和制造语词“freeter”的音译，系由英文“free”（自由）和德文“Arbeiter”（劳工）合成，义为自由打工族。

② 即“NEET”，系“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既未就学，亦未就业或参加职业培训）的缩写。指15—34岁的既未就学，亦未就业的青年，日社会统计称之为“若年无业者”。

③ 三浦展著，《下流社会——新的阶层集团的出现》，光文社2005年9月初版。

④ 据内阁府2013年版《儿童·青年白皮书》。

⑤ 日文写作“ひきこもり”。指那些终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必需的购物和兴趣需要之外，基本不外出的15—39岁的群体。据日内阁府统计，2010年度，全国约有69.6万这类人。

风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甚至开始“越界”——向欧美，乃至中国蔓延。今天，“宅男”“宅女”不但早已在中文中定型，且有种时尚味。英语中，语义上与“OTAKU”近似的表现是“Nerd”，指深陷于某种兴趣之中的趣味“中毒”者。而电脑和电子产品的“中毒”者，则称为“Geek”。

正如“夏虫不可以语冰”，对宅男（女）们不可以谈就业，一谈就“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打算就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选择从主流社会“脱轨”，不为别的，为的是自己的趣味，或者说“趣味的事业”，这是一群真正的、纯粹而坚韧的理想主义者。如村上春树被认为带有很强的宅男倾向，他的小说，尤其是成名作《挪威的森林》被看成宅男（女）的“圣经”。另一位新锐作家、芥川奖得主田中慎弥，出生于1972年，从一所工业职高毕业后，没“工作”过一天，职历为零，每天关在家里写小说，二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堪称宅男模范。他甚至没有与女性正经“交际”的经验，平生接触的女性除生母之外，至多是街上便利店的女收银员和出版社的女编辑，但这并不妨碍其小说中“出位”的性描写。

更多的宅男（女）从事艺术和媒体行当，却也并不隶属于某一家艺术或传媒机构，而是以自由艺术家、自由摄影师、自由编辑、独立记者、独立作家的身份工作，自由创作，以自己的艺术文化产品，赢得尊严和一份有尊严的生活。从而不必风里雨里、朝九晚五，不必在通勤高峰时赶拥挤的电车，不必在意上司的目光和绩效指标，尽可以自己习惯的节奏（My Pace）工作，爱谁谁。这种“御宅型”生活方式（或曰生产方式）本来就颇有魅力，“3·11”巨震后，更以其“低碳性”获得更多时尚青年男女的青睐，悄然坐大——我个人把这种现象看作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的开端。譬如，今天颇有些小众趣味的“文化志”类读物，完全不同于《文艺春秋》《周刊朝日》等传统杂志的做法，由

一群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自己约稿、写作、编辑、出版，面向特定的读者层定制发行，出版物的版权页上甚至连法定地址都没有，但却是合法出版、进入主流书店并拥有固定读者群的杂志。如果哪天，你在涩谷或下北泽的一间廉价咖啡馆里见到一群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边争论边用笔记本电脑在记录什么的话，请勿见怪，那说不定是编辑部在开选题会，你兴许就是他们的读者呢。

在东京西郊中央线的沿线，分布着大批青年艺术家、漫画家的工作室。如果把手冢治虫工作室、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比作日本动漫产业的“机关车”的话，那么，机关车的后面，还挂着一长串车厢，像一条繁忙的生产线似的，昼夜运转。而那些宅男（女）及其工作室，基本就相当于挂在后面的车厢，或者是车厢的一部分。不仅是动漫产业，东洋庞大的文化艺术产业，乃至广义的内容产业中相当大的份额，其实是靠宅男（女）支撑的。

因此，中国媒体一提到日本的社会贫困现象，动辄便与宅男、宅女相提并论，并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想当然地把东洋“御宅族”想象成中国“啃老族”那样的寄生人群，认为是“国家的负担”，甚至“社会之痛”，不能不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与多数“飞特族”“尼特族”不同的是，“御宅族”恰恰是日本当下活色生香、魅力四射的青年亚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使命的承担者，由他们开创的一种不同于既往的、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的新型消费文化及这种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方兴未艾，说不定代表了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 不一样的“医疗崩溃”

另一个以中国现实来想象日本的误读是所谓“医疗崩溃”问题。鉴于中国的医疗改革经过多年试水之后，结果失败，面临方向性调整的事实，这样一个本土的问题再次被“国际化”：政府发言人出来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美、欧、日，都有自己的问题。于是，日本的“医疗崩溃”问题再次被拎出来“陪绑”，接受中国舆论的“审判”。

那么，日本的“医疗崩溃”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呢？应该说，发改委发言人总算“言中”了一回。但是，且慢，此“崩溃”毕竟不同于彼“崩溃”。拙著《“下流”的日本》（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54页《漫谈日本的“医疗崩溃”》）中，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番不厌其详的功课。就结论而言，中国的问题是公共医疗领域财政投入的刚性不足、医疗资源分配高度不均造成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日本的问题，则又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因此，基本不具备可比性。

大约从2006年起，日本的医疗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医疗资源呈慢性不足，医生劳动强度过大，动辄“过劳死”，开始出现“超医疗格差”<sup>①</sup>等问题上。媒体危言耸听地预言，现行的全民覆盖的普遍医疗保险制度（于1961年投入实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转，由于人口老龄化、年金积累不足等，将于2020年前后面临实质性崩盘的局面。

但是，如细加考察，便不难发现，日本所谓的“医疗崩溃”前兆，并非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等外部因素所致，而是医师不足等医疗体制内部

---

<sup>①</sup> 由于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额诊疗费的富人患者可以在五星级酒店般的高档病房中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但同时，近两成的病患因无力加入民间医疗保险而无法享受哪怕是基本的医疗服务。

的因素所引发的。简而言之，是社会达到普遍富裕之后，人们对财富追求的热度开始下降，代之以对自由、闲暇、舒适等的追求。且越是富家子弟，这种诉求越强烈。医科大学学费贵、学制长，毕业后到成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还要经过漫长的历练。即使好不容易熬成了“一把刀”，也要定期上手术台，节假日还得出急诊，工作强度极大不说，万一出了医疗事故，还要面对诉讼的压力。因此，从医师供应链的上游——医学院，便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如著名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是顶尖水准的国立医科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全无就业问题，且年薪不低于3500万日元，长年以来是富人子弟云集的学府，竞争极其激烈。然而，如此精英学府，近年来却深陷招生不足的怪圈，遑论国内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今天，日本的“富二代”“富三代”，早已不再青睐“白色巨塔”里的成功，转而把目光投向了诸如艺术、语言学、文学、博物馆学等远离实务的“务虚”专业。

这种状况已持续有年，酿成了日本国内各层级医疗机构医师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儿科、妇产科医师严重短缺，成了困扰医疗改革的紧迫课题。五年前，东京曾发生过临盆的产妇在救护车上因大出血而死的惨剧：临盆的产妇急于送医，在救护车上辗转数家医院，均被告知“病房已满，无法接收”，继而引发悲剧。这种案例，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和放大，在发达社会国民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挥之难去。未来，日本政府也许不得不克服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障碍，从海外大量招募医师和护理人才，“奥巴马”“欧吉桑”们将不得不尝试并习惯与操着非母语的日语或英语的外国医师们沟通病情。

这，才是日本“医疗崩溃”的实态。

## 语义含混的“他者”

记得上一次京城持续大雾霾的某天中午，我戴着猪嘴型防PM<sub>2.5</sub>的口罩，穿过大半个城市，从临近东五环的家，赶赴位于大钟寺附近一家著名新疆餐馆的饭局。途中，望着车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混沌，心生绝望，头一次严肃地思考移民的可能性，并随手发了一条微信：“雾霾、通胀、地沟油、堵车、地铁安检，帝都生活五大不爽，没一个能望见解决出口。”一时间应者如云，倒也不无热闹。

提起这些问题，我首先想到这些年来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对日“借鉴热”。借鉴什么呢？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唯日本曾经历过从战后废墟上，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奇迹般的发展崛起，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挫折，才成为国人和本土媒体所格外看重的“他者”镜像，笔者自己也屡屡接到过这类稿约。一个总的感觉是，谈成功经验的少，谈失败教训者多。我一般不大愿意谈这些，岂止是不愿谈，简直是反感谈，千方百计回避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所谓“他者”经验教训的泛泛而谈，非但没好处，反而是有害的！但同时，我也发觉，有些媒体特别喜欢谈这个，有的简直像吸毒一样，上了“借鉴瘾”。随便在网上检索一下新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尤其是当发生某些社会性事件的时候，人民系、《环球时报》等媒体一准会在第一时间推出一篇甚至一组借鉴“他者”的文章。而被借鉴的“他者”，十有八九是日本：毒饺子事件发生后，借鉴了和歌山毒咖喱事件；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借鉴了森永牛奶投毒案和雪印毒牛奶事件；动车事故后，被借鉴的是兵库县尼崎列车出轨事故；华北地区连续大雾霾发生后，又借鉴了四日市化工厂毒气污染，造成大量市民罹患哮喘病的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如果细读这些“他者”借鉴的文字，你会发现：他们只热

衷于向你传达异域也发生过这么一些类似的案例，却很少告知解决的结果，对解决的过程更是语焉不详。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你的“他者”借鉴的目的何在？诉求是什么呢？更吊诡的是，那些借鉴文章的写手，很多是做日本问题研究的学者，或者旅日华人作家，他们明明对问题解决的过程和结果一清二楚，却缄口不言。

去年，我曾在一个出版会上说，所有以中日两国媒体为平台发表意见的公共写作者，在涉及日本的“他者”经验、教训时，都有义务与责任向中国读者传达准确、全面、完整的信息，包括那些历史事件、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案、路径与结果。否则，对那些日复一日在雾霾中艰难呼吸且不知还要呼吸到何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对所谓“他者”经验的片面借鉴的实效很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甚至是邪恶的：因为你的“借鉴”，只是为中国当下发生的众多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注脚而已。而这些问题本身，不仅解决遥遥无期，而且会因你的关注及以所谓“他者”为名义的“高大上”注脚，得以“国际化”，反而成了拖延解决的“理由”。

2005年，国内曾引进出版了一本书《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是长年跑司法口的日本著名社会记者、《每日新闻》社会部部长山本祐介。在书中，山本复原了日本最高法院从1947年成立，至1997年的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追踪了从战后初期的几桩著名政治黑幕疑案，到经济高速增长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害、民生大案的司法审判轨迹。其中有些案例，是近年来颇受中国媒体关注的公害诉讼大案，如熊本县水俣市的水俣病案、富山县妇中町的痛痛病案和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案等等。我们应当看到，包括这些当时就震惊日本全国，甚至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又不断被中国媒体反复“借鉴”的大案、要案在内，日本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错，酿成的一系列民生问题，经过其国民、舆论的



长期斗争，均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解决。很多案例，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在事件已然尘埃落定数十年后的今天，经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仍被维持，在加害者的企业法人和受害者及其家族之间，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仍在支付。

这，是我们在谈论日本的“他者”经验时，务须正视的事实。只谈问题，而不谈解决的方案、路径和结果的话，不仅是对日本的不公平，更主要的，是于事无补，不利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你“舍近求远”，借鉴“他者”的目的何在？难道不是着眼于中国的当下吗？

### 解决的路径：“组合拳”

那么，日本社会解决公害、民生问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政治反对：战后日本，从1955年直到“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3年，被称为“55年体制”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则体现为“自民党 vs 社会党”的所谓“保（守）革（新）对决”的构架。因此，在冷战时代，左翼在野诸党，其实有不小的政治反对空间。

此外，由于日本奉行高度的地方自治制度，虽然中央政府姓“自”（自民党），但具体到不同的地方，也不乏姓“社”（社会党），甚至姓“共”（日共）的地方自治体。某个地方发生公害、民生事件时，政治反对势力会率先动起来。当然他们最大的诉求，可能是反执政党。但对政治反对势力来说，最有效的反对，莫过于通过某个具体的公害或民生案例，来做成自己的“业绩”。姑且不问政治反对者的内心诉求，这种